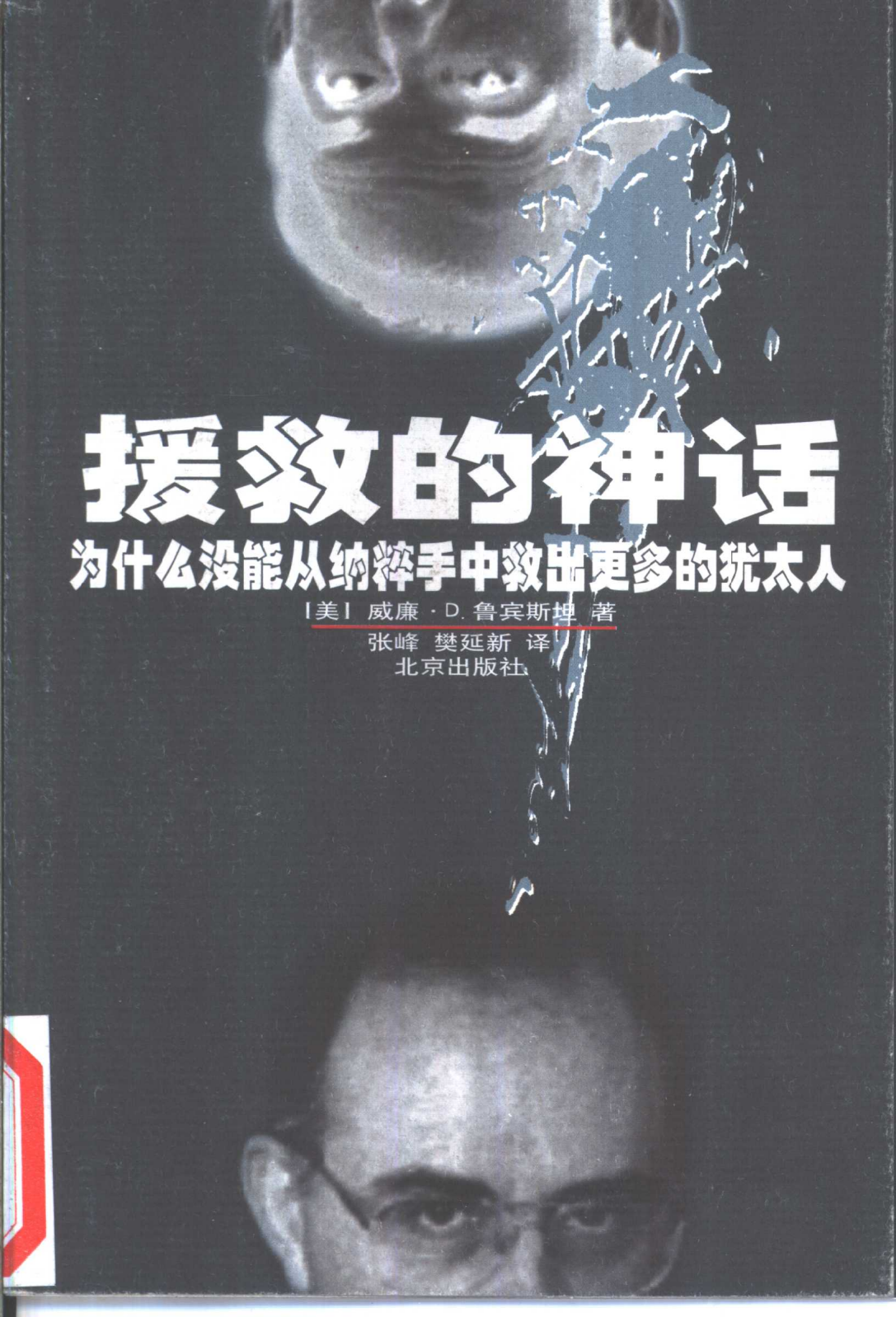




援救的神话

为什么没能从纳粹手中救出更多的犹太人

[美] 威廉·D. 鲁宾斯坦 著

张峰 樊延新 译
北京出版社



援救的神话

为什么没能从纳粹手中救出更多的犹太人

[美] 威廉·D. 鲁宾斯坦 著

张峰 樊进新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援救的神话:为什么没能从纳粹手中救出更多的犹太人/(美)鲁宾斯坦(Rubinstein. W. D.)著;张峰,樊延新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ISBN 7-200-04006-1

I. 援… II. ①鲁…②张…③樊… III. 犹太人-问题-研究 1939—1945
IV. D8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949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9—2651 号

© 1999 年中文简体字版, 经由 Routledge 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THE MYTH OF RESCUE-why the democracies could not have saved more
Jews from the Nazis, by William D. Rubinstein. © 1997 William D. Rubinstein. First published 1997 by Routledge.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他者文库·审视纳粹

援救的神话

——为什么没能从纳粹手中救出更多的犹太人

YUANJIU DE SHENHUA

[美]威廉·D. 鲁宾斯坦 著

张 峰 樊延新 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36 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0-04006-1

D·351 定价:19.00 元



本书特点在于:

一、作者均为美籍华人，对美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品头论足”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心平气和，有的放矢。

二、作者们虽然长期居住在大洋彼岸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但在特定的人文心理上,仍与国内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近的认同感。

这种“根”的共鸣，会使这本近距离透视美利坚的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为国内读者窥视四万里之外的那个庞大帝国，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请参见本书《出版者的话》。

本书要目，详见后勒口。



本书要目

责任编辑：高苏
封面设计：王海宁
版式设计：李芝文
督造：李芝文
刘霆

智神比尔·盖茨
马龙·白兰度之欲
杰佛逊：女人与房子的悬案
现代福尔摩斯——李昌钰
如何在美国成立公司
如何在美国申办L-1签证
如何在美国调整身份
新移民在美谋职五戒
美国的华人职业介绍所
打工辛酸
移民心路
在老美家办私塾
在美国吃螃蟹
在美国当房东
在美国教书
揭穿赌场惯用的几种作弊手法
最新美国热门学科学府排行榜
美国大学对外籍学生入学的新限制
美国儿童使用电脑现状
比尔·盖茨的最新预测
三大男高音对古典音乐的伤害
史密森尼博物院的创建
纽约夜生活
美国法学院受冷落
美国医生供过于求
公司大老板：体面的罪犯
谁是美国的高收入者
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中国论风水，美国也发烧
电脑致癌新说
新款凯迪拉克问世
哈佛的魅力
美中地理——人口对比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关于援救的历史学研究	(6)
第二章 1933 年—1939 年关闭大门的神话	(30)
第三章 援救计划的神话	(106)
第四章 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神话	(229)
第五章 战时难民局的神话	(268)
第六章 和纳粹分子谈判的神话	(295)
第七章 援救的神话	(308)

导 言

本书的论点是，在已经对大屠杀有所了解的情况下，虽然当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援救方案**，并且做了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工作，但同盟国当时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却未能拯救在纳粹大屠杀中死去的犹太人。如果对这种论断来说有所例外的话，那么也许提供的数字也不过几十人或几百人，不会再多了。**所有批评同盟国（包括犹太人社会）未能把犹太人从大屠杀中拯救出来的研究，都是不确切的和误导的**，其论点是不合逻辑的和非历史的。事实上，的确有一些断言广为流传，但如果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为本书提出的论点（其中大多数是以前没有人提出过的）所折服，那才真正令人感到惊奇了。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本书所做的论证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希特勒、纳粹及其帮凶——而且只有他们——才对大屠杀负有全部的、完全的责任。

本书认为，关于同盟国援救犹太人这个主题一直受到误解。因此，本书在讨论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历史研究的进展之后，第二章将集中研究1933年—1940年西方世界非常宽厚的难民政策。这个问题差不多也总是被误解的，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全面的解释。本书最长的一章，即第三章，详细考察

了在战争期间同盟国实际上提出的援救计划，其根据是我所知道的美国或英国的任何个人或团体提出的**所有算是**援救犹太人的计划的東西。本书最后几章研究其他一些广为流行的援救的神话：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可能性的神话，美国战时难民局拯救了大约 20 万犹太人的生命的神话，以及和纳粹谈判以拯救犹太人生命的可能性的神话。最后，对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些特殊的“原本可以做的事情”的提法予以评注和批判考察。

也许值得在此谈一下我关于这一主题的看法的形成过程。如果有人努力发掘一下我在 1982 年写的关于战后反犹太主义变化的著作《左派、右派和犹太人》（伦敦 1982 年），或者我为 1986 年主编的各种研究犹太人史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的文集《第六大陆的犹太人》（悉尼 1986 年）写的导论，就会发现，当时我完全接受那种认为同盟国和同盟国的犹太人社会在大屠杀期间“没有做任何事情”，并且应当因这种错误而受到严厉谴责的观点。然而，甚至在当时，我也深深意识到，为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而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历史行动者并不知道，并在很大程度上无力改变的事情而指责他们，是不合逻辑的。我已经准备改变我的观点。

如果我需要说出我思想上的关键的转折点的话，那就是 1988 年我和沃尔特·乔纳进行的一次谈话。沃尔特·乔纳是墨尔本犹太人社会的一个知名人士，在维多利亚州议会供职多年，后升任为在维多利亚政府长期任职的内阁部长。30 年代，乔纳的父亲和叔叔是地方犹太人社会的领导成员（也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父亲担任过墨尔本犹太人社会的最早代议制机构，即维多利亚犹太人顾问委员会的第一任委员长。我向乔纳解释了过去几年澳大利亚犹太人历史学家关于澳大利亚和大屠杀所提出的观点，特别是他们认为，当时完全被同化

的澳大利亚犹太人社会对难民置若罔闻，澳大利亚接纳犹太难民的记录简直糟透了。乔纳显然以前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理论。他感到非常迷茫和窘迫。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对我说：“不，这完全不对。我记得在我十几岁时，我父亲和我为了难民不分昼夜地工作。”也许很奇怪，这次偶然的谈话导致我重新审视我关于大屠杀时期援救工作的观点。最终我得出结论，我以前的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就是由于同难民时期的一个老战士的谈话而产生的。

本书的大部分问题是我在澳大利亚杰隆的迪金大学进行研究的，我曾在那里担任社会和经济史教授。本书的几章也是在那里写的。其余的部分是我在威尔士—阿伯里斯威思大学担任现任职务后不久写的。不言而喻，如果没有特殊的帮助，在澳大利亚是无法写作和研究战时美国和英国的著作的。为此我特别感谢我获得资料的三个来源。迪金大学的馆际借书服务是杰出的，我毫无困难地在当时最模糊的资料中得到了几百页的文章。由已故的赫什尔·埃德尔海特和他的儿子亚伯拉罕·J. 埃德尔海特博士汇编的三卷本《大屠杀文献书目》（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1986 年—1992 年）证明是无价之宝。没有它，我的著作就不可能写出来。戴维·S. 怀曼教授编辑的 13 卷本的原始文件集《美国与大屠杀》（纽约 1990 年）也是同样珍贵的。尽管我从根本上不赞成怀曼教授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但每一位学者都得益于他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可资利用的原始材料。许多信友对我的研究也有帮助，特别应当感谢的是四个人：杰拉尔德·弗莱明博士对希特勒和大屠杀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评论；詹姆斯·H. 基钦斯博士对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军事技术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马丁·吉尔伯特爵士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西雅图的理查德·H. 利维博士阅读了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并进

行了卓有见地的评论。自然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希拉里·L. 鲁宾斯坦博士，以及我的打字员迪金大学的玛格丽特·莫尔顿，因为在我移居威尔士后，她仍为我提供了她非常娴熟的服务。

我还要向下列人士表示我最深深的谢意，他们要么为我提供了信息，要么经常对我的解释给予详尽的评论：雅克·阿德勒博士、杰弗里·奥尔德曼教授、马克·贝克博士、保罗·R. 巴特罗普博士、杰胡达·鲍尔教授、伦道夫·L. 布雷厄姆教授、保罗·布朗博士、理查德·布赖特曼教授、亚伯拉罕·埃德尔海特博士、亨利·L. 费恩格尔德教授、雷蒙德·卡尔曼、雷切尔·科恩博士、托尼·库什纳博士、伊什·莱布勒、黛伯拉·E. 利普斯塔特教授、帕姆·麦克莱恩、巴巴拉·罗杰斯、弗兰克·瓦德加博士、威廉·范登·霍伊维尔（罗斯福研究所）、戴维·S. 怀曼教授和埃弗莱姆·朱罗夫博士。尽管这个名单中的许多人（但决不是全部）并不赞成我书中的观点；然而，我还是要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我最深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一些机构和图书馆给予我的帮助，特别是迪金大学的澳大利亚与国际研究院和迪金大学图书馆，南安普敦大学的帕克收藏会，利物浦大学图书馆，美国移民局档案馆，纽约 YIVO 图书馆，克利夫兰（俄亥俄州）犹太人社区中心和纽约海德公园的 F.D. 罗斯福图书馆。我曾把关于“援救的神话”的研究文章呈送澳大利亚犹太人研究学会和澳大利亚现代英国历史研究会的研讨会，呈送迪金大学的澳大利亚与国际研究院的研讨班，呈送牛津大学犹太人和希伯来研究中心，以及墨尔本的几个犹太人团体。我真诚地感激我当时得到的评论和建议。

我不敢断定已故的露西·S. 达维德维奇会喜欢我的书，但显然她会赞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只碰到过露西·达维德维奇一次，是在纽约 1980 年的一次纪念会上。但即使这么短的

一次邂逅而遇，她的智慧、清晰、直率，特别是广博的知识，已经给了我持久的激励。我相信把这本书献给这样一位把常识同深刻透彻的历史判断以罕见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学者，是很合适的。

威廉·D. 鲁宾斯坦
于威尔士—阿伯里斯威思大学

第一章 关于援救的历史学研究

在整个现代史的领域，很少有哪个主题会像同盟国在纳粹大屠杀时期援救犹太人这样的题目，造成当时的观点同后来历史学家和作家的观点如此迥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和反纳粹的非犹太人）企盼同纳粹德国作战的同盟国的著名领袖——温斯顿·邱吉尔和富兰克林·D. 罗斯福——作为解放的军队统帅，把整个世界特别是犹太人民从纳粹的蹂躏下解救出来。1944年12月，英国犹太教首席教士约瑟夫·赫茨给温斯顿·邱吉尔发出一封生日祝贺信，上面写道：

由于你的智慧和勇气，英国不会出现一个维希式的政权向力大无比的恶魔势力俯首称臣。这种恶魔势力给西方人民带来了奴役，给以色列人带来了死亡，给人类神圣遗产带来了黑暗。但愿上天赋予你更多几年的卓越领导地位，重建被毁灭的世界。^①

^① 犹太教首席教士赫茨《致邱吉尔 70 岁诞辰的贺信》，《犹太记事》，1944 年 12 月 8 日。

美国犹太人是富兰克林·D. 罗斯福“最忠诚而可爱的”选民；^① 在美国的反犹主义者看来，罗斯福的政策是亲犹太人的，并且在“犹太人力量”影响下制定了“犹太人新政”。30年代的一位共和党犹太人国会议员乔纳·L. 戈尔茨坦得出结论说：“犹太人有三个世界：现世、来世和罗斯福。”^② 然而，最近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在评论“过去几年美国犹太人对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态度的奇怪转折”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瑟·M. 小施莱辛格指出：

长期以来，罗斯福是一个英雄。没有哪一个总统会任命这么多的犹太人担任公职。没有哪一个总统的周围会有这么多的犹太人顾问。没有哪一个总统会如此雄辩而固执地谴责反犹主义。在这些遥远的年代里，犹太人大多数都是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都四次投票支持老罗。^③

对同盟国及其领袖看法上的这种重大而深远的变化，是在从 6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突然产生的，完全是因为一种近乎普遍的观念造成的，即在大屠杀期间同盟国实际上没有为援救欧洲犹太人做什么事情。到 80 年代后期，各种关于同盟国对大屠杀的反应的考察，不得不考虑一种实际上已经

① 亨利·L. 费恩格尔德《罗斯福时代的犹太人领袖》，见亨利·L. 费恩格尔德《作证——美国及其犹太人对大屠杀如何反应》（锡拉丘兹 1995 年），第 241 页。

② 梅尔文·L. 尤罗夫斯基《我们是一家——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纽约加登城 1978 年），第 46 页。

③ 阿瑟·M. 小施莱辛格《老罗背叛犹太人了吗？或者他是否在拯救犹太人问题上比别人做得更多？》见维恩·W. 牛顿编《罗斯福与大屠杀》（纽约 1996 年）第 159 页。

流行起来的信念，即在希特勒的“最终解决犹太人”时期，同盟国“没有做什么事情”，而且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成了大屠杀的实际帮凶。人们列举的所谓的同盟国的一系列过错很多，从大屠杀之前和大屠杀期间对犹太难民关闭移民大门，到阻止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作为十分必要的避难地，没有轰炸奥斯威辛或其他死亡集中营，没有同纳粹谈判以换取犹太人的生命，在1944年初以前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来拯救犹太人的生命，对希特勒正在进行的“反犹太人的战争”视而不见等等，不胜枚举。造成这些过失的所谓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美国 and 英国舆论制造者与群众中普遍浓厚的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无视纳粹的意图，官僚主义的惰性以及不把战争期间难以置信的大屠杀恐怖放在心上。同样，人们还普遍认为，用后来的标准看，同盟国的犹太人社会在犹太民族最需要他们的时刻却苟且偷安，四分五裂，害怕在二战期间过于显露。

这些看起来似乎很有力的论点一再为职业历史学家所重复，现已扎根于大众的想像中。然而，所有这些论点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是缺乏法律根据的；本书以下各章将表明它们是粗陋错误的、不确切的。这里，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关于援救的历史学研究是如何以现在的形式出现的，以及作为崇高的英雄和解放者的邱吉尔和罗斯福的亲犹太人的和反纳粹的观点是如何彻底改变的。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来说，也许没有一本关于大屠杀的历史著作批评同盟国的行动，或者提出许多本应做而却没有做的要求。^①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所有早期的关

① 例如，1963年纽约的同盟世界协调委员会秘书伊曼纽尔·谢勒声称：“今

于大屠杀的著作，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纳粹及其盟友的罪责上。抨击同盟国在援救犹太人问题上的过失的著作，当首推鲁本·安斯泰因的一篇不怎么受重视的文章，题目为《是不是能够救出更多的人？》。安斯泰因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以研究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反抗历史而著称。安斯泰因的文章发表在1967年的英国刊物《犹太人季刊》上。在其他历史学家提出同样的论点几年前，他的研究中就包含着许多对一直被视为标准的同盟国政策的批评成分。例如，他确切地考察了何时西方最早知道“最终解决犹太人”的消息，而其他历史学家则是在10年后才详细考察这一问题的。安斯泰因声称（第17页）：

美国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因素同仍旧有力量的种族隔离主义势力结成联盟，甚至在1943年也是很强大的，足以向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国务院提供理由，不要做任何可以被解释成把援救犹太人作为美国进行战争的一个目的的事情。

他的这一断言在后来的几十种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中得到了回应。然而也必须指出，很早以前，安斯泰因就犯了在考察这

天，根据各种各样的事实和可利用的文献（在战争期间是不易得到的），显而易见，〔华沙〕犹太人区之外的惟一力量，民主的和更人道的国家，原本能够采取特定的军事步骤来遏制纳粹及其走狗，认真地拯救犹太人。”“原本应当在海乌姆诺第一次大规模屠杀和建立华沙犹太人区之间的14个月间〔大致是在1941年12月至1943年2月之间〕就给犹太人提供这样的帮助。”“在这一时期，提供有效的帮助行动是必要的，而且在我看来是可行的。”（《社会主义国际》1963年4月27日，引自威拉迪斯拉夫·巴托斯切夫斯基《1939年—1943年德国占领下的华沙犹太人的殉难和斗争》，见威拉迪斯拉夫·巴托斯切夫斯基和安东尼·波龙斯基编《华沙的犹太人——历史》，牛津1991年，第332页）谢勒并没有说明这些“特定的军事步骤”是什么，以及盟军从东到西1000里的前线如何能采取这些军事步骤。

一问题上可能犯的每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错误，包括祸根论，即认为美国在战争开始后接受的难民很有限，原因在于它的限制性的移民法，而不在于希特勒在对犹太人种族灭绝之前阻止犹太人移民。也许只有所谓的没有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安斯泰因没有提到——是这个标准的指控单上所没有的。

安斯泰因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第一批以同盟国的过失为主题的著作出版了，如阿瑟·莫尔斯的《在六百万人死亡时——美国冷漠纪事》（纽约 1986 年）和戴维·S. 怀曼的《纸墙——美国与难民危机，1938—1941》（波士顿 1968 年）。70 年代出现了更多的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其中有亨利·L. 费恩格尔德的折衷的学术著作《援救的政策——罗斯福的领导与大屠杀，1938—1945》（纽约新不伦瑞克 1970 年），然而这一著作既批评美国的政策，也意识到了对这一主题新的否定性的解释。其他诸如此类著作有索尔·弗里德曼的《被压迫者没有天堂：1938 年—1945 年美国对犹太难民的政策》（底特律 1973 年）和赫伯特·德鲁克斯的《援救的失败》（纽约 1977 年）。这些著作的题目准确地表明了他们的观点。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些著作，或许对那种认为同盟国在大屠杀期间未能援救犹太人的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著作的作者是戴维·S. 怀曼——马萨诸塞—阿默斯特大学的一位非犹太人历史学家。^① 1978 年 5 月，在有广泛影

① 我之所以提到怀曼的背景，只是因为他本人故意让人们知道这一点，直率地让人把这看作是重要的。在《放弃犹太人》一书中怀曼指出：“我不是作为一个局内人写作的，我是一个基督教徒，美国式的新教徒和瑞典人的后裔……美国的基督教徒忘记了乐善好施者……大屠杀肯定是犹太人的悲剧。但它又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悲剧。它也是基督教徒的悲剧……最能有所帮助的旁观者是基督教徒。”（纽约 1984 年，第 ix, xii 页）

响的犹太人月刊《评论》上发表的《为什么没有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一文中，怀曼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即 1944 年同盟国能够很容易地轰炸并摧毁奥斯威辛集中营，但出于各种完全不充分的理由，而没有选择这样做；他把所谓的同盟国没有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作为对美国和英国在大屠杀期间一系列过错的第一项指控。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对于非历史学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和非常可行的事情，很快就抓住了犹太人以及非犹太人的想像力。恰恰在此时，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承认，大屠杀也许是人类败坏到的最极点，邪恶得简直不可思议，大屠杀问题实际上开始支配当代犹太人的思想。

六年后的 1984 年，怀曼出版了他引人注意的关于所谓美国在大屠杀期间的过错的著作《放弃犹太人——美国与大屠杀，1941—1945》（纽约 1984 年），对美国在“纳粹最终解决犹太人”期间多方面的过错做了详细的说明，而且表面看来既是令人信服的，又是激动人心的。书中的反面人物自然是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该书之所以流行开来，显然归因于它表面上有说服力的证据，即美国自由主义和美国犹太人社会以前的神至少说是纸老虎。怀曼还承认这样的看法，即修正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严格正统的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社会内部的其他“格格不入者”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和彻底的援救欧洲犹太人的计划，但却遭到了保守的圆滑的美国犹太人“既有机构”的拒绝。他还更详细地重复了他的非议，即 1944 年美国军队本来是能够成功地轰炸奥斯威辛的，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看起来值得考虑的详细的“本应做的事情”的要点。他的著作——同其他大约在同时发表的著作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完全左右了我们关于同盟国在大屠杀期间采取的行动和不